

經典常談

心裁

朱自清◎著 栗强◎疏释 宗平◎编按

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夫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注
。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
，识见之高远，尤令人叹服；而更以治学态度之智为最难得。先
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导

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史兵的一
识经典，那就是以釜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佩弦先生的思想一直是紧跟时代步伐的，至其思路之
发扬、介绍、修、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再加上一副
，使人读了先生的文章，不惟不倦，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



线装书局

7835

23

2007

經典常談

心裁

朱自清◎著 栗强◎疏释 宗平◎编按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常谈心裁 / 朱自清著; 栗强疏释; 宗平编按.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1

ISBN 978-7-80106-386-1

I. 经... II. ①朱...②栗...③宗... III. ①社会
科学—古籍—简介—中国②经常常谈—注释

IV. 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306 号

责任编辑: 于建平

封面设计: 亿点印象工作室

版式设计: 塔院书林工作室

监 印: 初 仁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1.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解释的困惑 (代前言)

不知道上古之人，像伏羲、文王他们，画卦做《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参考书；那唱着“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歌谣的先民们作歌时，有没有什么文学审美的标准；写《尚书》、《礼记》的君子们有没有背过什么范文？……大概那会儿的人还不太善于用别人的思想武装自己，真是令人羡慕的自由。

人们被经典武装了两千多年，时时有人跳出来几句惊天动地的要求思想解放的话。明朝的时候出了个王阳明，说得真是精彩：“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何等的不倚傍他人的独立精神，何等壁立万仞的气魄！读书、做人最基本的心态。

现代还有个高人，刚过世没几年的徐梵澄先生，对于读书、写文章的态度，也曾说过令人击案称绝的一段话：“在学术上，多闻阙疑的态度异常重要，那些纪录中不是无理可寻，但不是一本据学理而衍成的书；许多我们不懂的，只好存而不论，即算为我们所懂到，却又有不应解释或不应那么解释的，因为原本往往是一活生生的事物，或者一落入我辈的解释便死了。倘若我们懂到，又明觉不至于将一概活真理弄死，那么始可试行解释；然重在得到明确的主观。这里所说的主观，不是凭观者为主的主观，而是以对象为主的主观。譬如读三百篇，便当以三百篇的立场、见解，去了解三百篇，不是

以近思录而读三百篇。推而至于估价、比较，以至于批评，所重亦复在此。”

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活泼的态度、真正谦虚的态度，也就是孔子他老人家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在这本书的序里，朱自清先生把他编写这本书、乃至栗强先生、宗平同学作疏作评的主要意图都写得很明白了：“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在此多一句嘴——我们为什么要读那些经典呢？用他人的思想武装自己吗？不是！这些经典里深藏着“中国人的精神”，用你自己的心去读，让那看似无形却真实存在的精神之火引燃你自己内心的精神之火，“所立在大”，心中有了主宰，真切见了道，才给中国文化还了魂，才可化繁为简，一以贯之。

写在这儿，忽然想起尼采曾经说过的话：“这类事我是亲眼看见过的：自由的、丰富的、优秀的天才不到三十岁便已‘读坏了’，变成了火柴，不敲打是不会发火的——产生‘思想’。在黎明，自己的清爽和心力的朝阳中，而读着一本书——我以为这是累赘的。”

宗平

北京香山晴斋

二〇〇六年孟冬

原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圇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

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

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1942年2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CONTENTS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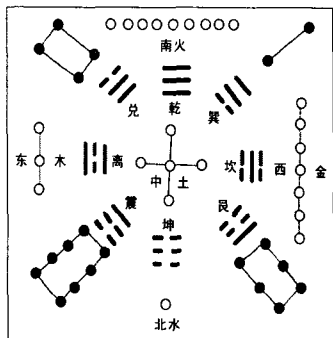
1	解释的困惑（代前言）
1	原序
1	周易
17	尚书
28	三礼
37	四书
45	诸子
60	春秋三传
68	战国策
77	史记汉书
95	文
113	诗经
125	辞赋
137	诗
152	说文解字
166	后记：经典、人心与佛典

周易

曾有人说《易经》是世界之最难读的两本经典之一。另一部，据传是和《易经》同一时期的著作——印度的古籍《波尼尼》。实际上真正说来恐怕不是难读，而是难懂。这好像英国著名科幻小说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直译为《银河系漫游手册》，被评为最优秀的10部科幻小说之一，2005年拍成了同名的电影，国内没公映。原书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里面那个被多空间生命体制造的计算机创造出的连多空间生命体自身也制造不出来的超级计算机，在经过不知多少万年的运算后终于能够回答多空间生命体们关于“生命的意义宇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询问时，其给出的答案，竟然是“42”。真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易经》也如此，虽然数千年来有不知多少最极聪慧之士穷其一生地研究玩味，最终却也只能像是小说中的“42”一样。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着甚深的微妙，却是谁也说不出其微妙的所以然。

历来文人学者给古书作广告，都是要讲一番古书如何不难懂的道理，用以鼓舞青年的勇气，让看了广告的人有胆去读。这里却是先浇上一盆凉水：说是谁也没有能够把《易经》弄个明白。真像佛教常说的，“只闻千万人去学法，不见一两个能得道”。古人都没读懂，今人该怎么办？按金克木先生的说法，第一是把文言当白话读，第二是可以跳

八卦配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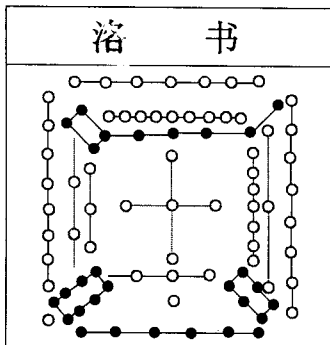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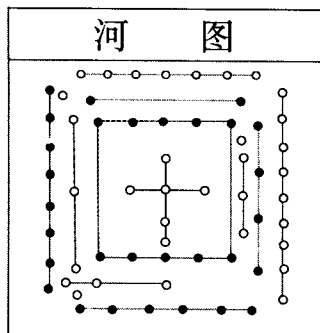
着读，千万不求处处都懂，第三是自己去解说，边读边解。“别去找标准答案，那是不存在的，深浅只能由自己，别人是帮不上忙的”。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习，这些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的。那时候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便是那个。

疏释：

河图与洛书，是古代学术里的大秘密。现代学者，往往视为糟粕，语焉不详。实际上，是一种大逃避的态度。究其原因，就在于总想用现代的，源于西方的数理逻辑理论来理解传统的华夏文明。这是一条行不通的“死



4	9	2
3	5	7
8	1	6

路”。要是我们回到传统的视角来体悟，则即便不能完全把“黑箱”透视成“白箱”，至少也会让“死路”换成一条“活路”。比如洛书，如果不再把它看成是三阶幻方，而是画成原本的模样，会发现，每条对线，不只是有着相加和为 15 的特点，而且都是由两个“阴数”夹着一个“阳数”来构成的。用图上的符号，就是两组黑点夹着一组白圈。这叫做“重阴以贵阳”。最低程度上，表明了传统文化里，一方面重视青少年的学习教养和老年的休养安乐，另一方面也强调一个人生命最耀目的成就都应该在中年期得以显现的道理。

河图，文字表述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这便说：五行在北方为水，为寒，其生数为一，成为六；在南方为火，为热，其生数为二，成数为七……

怎么理解？《内经》讲了，“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先看水，国历一月，冰河解冻，绵绵春雨，应时而下。这个月份里的节气，叫雨水，也就是“天一生水”。到了国历六月，雨量最多，洪水往往发在此期，“地六成之”。火，国历二月，令在惊蛰，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是生长在大地上的人类得火的源头。“地二生火”。天上是没有火的，有的只是雷电，火却在地上。七月，“大火西流”，处暑主气，不正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吗？借用老舍先生的名句，“七月的天空下起了火”。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说大火乃大火星，七月流火乃天气转凉。

其他“金”、“木”、“土”与数的关系不一一谈了。最重要的思想：“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在我们的先民看来，天地之间微妙的阴阳之道，不是不可以加以推衍运算的，但不能像数理逻辑那样用

“抽象”的方式来推衍运算。中国文化的精粹要求我们不允许“抽象”这种方式。要“具象”，具足的象。不能“抽”。“抽”出来的，无论多像，都不是，不真。抽象是以理性和心思自我欺骗的路数。要运算推衍天地间的微妙，只能依靠完整的，不是“抽”出来的，具足的、具体的“象”，才行。

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经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笔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疏释：

“压根就没有伏羲氏这个人，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出来的。”

这种论调，学术史上称作“疑古派”或是“古史辨派”。恐怕，还不如“没有论”三个字来得更切当。“疑古派”的“没有论”，思路再简单不过：只要不能证明为有的古说，就不妨大胆地假设为“没有”，是“假托”。然后再小心地找出个说法来，让不明真相者信服，也就是了。其结论，是“历来公认的古史系统，不过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

这说法的思想根源，虽颇久远地横亘在一些人心中，但真产生出大影响的，还要首推顾颉刚。他发现《诗经》诸篇中只提到了禹，而《论语》里多

出了尧和舜，黄帝与炎帝在《史记》里最先出现，三皇五帝的说法和神农氏的名称出自《吕览》，而伏羲的名称更晚到《淮南子》里才见到……于是便断定记载了伏羲的《庄子》是至早与《淮南子》同时代的伪书，并作了一目了然的大结论。真是聪明！然而聪明则聪明矣，却抵不住改革开放后大修高速公路大搞城市扩张时掘出的文物，最后被证伪的不是顾先生所谓“层累出的神话”，反是他自己辛苦编写的等身之高的一大摞《古史辨》。真是可惜！但更可惜的还不是他，而是听了他的话就盲目信服的广大读书人。今天，我们不禁要问的一句话却是：就算没有出土文物作证，为何我们就会那样地信他呢？在信他、爱他的同时，我们心中那种畅快淋漓的“爽”，究竟是什么样的种子发出的苗芽？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是很少的。商代农业刚起头，游猎和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了，牛骨头便没有那么容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的。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筮的时候用它的杆子，方法已不能详知，大概是数的。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到什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也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

疏释：

想必读者中不少人对这看似复杂实则简便的“筮法”还是既弄不明白又感兴趣，希望有人简单介绍一下呢。原来，筮法里这样的：

取同株蓍草的茎 50 根。抽掉 1 根（这 1 根很重要，代表能生天、地、人的“一”），只用 49 根。双手将 49 根任意分为两份，左手里的“象天”，右手里的“象地”。从右手取出 1 根置左手小指间，“象人”。先用右手数左手中的蓍茎，再以左手数右手中的蓍茎，以四根为一组，数不尽，称作“余”。此“余”蓍数有一定规律，左 1 则右 3，左 2 则右 2，左 3 则右 1，左 4 则右 4。将左手所余之茎置左手中指与无名指间，右手所余之茎置左手食指与中指间，则左手各指间之茎数（包括一开始置于无名指与小指间“象人”的 1 根）非 5 即 9，故除去余数外必为 44 或 40，这叫“第一变”。

“一变”之后，去除非 5 即 9 的余数，以两手所持的 44 或 40 根草茎按“一变”同样的方法和顺序再演练一遍，叫“二变”。“二变”的结果，左余 1 则右余 2，左余 2 则右余 1，左余 3 则右余 4，左余 4 则右余 3，其和非 4 即 8，而去除“二变”的余数外的茎数为 40 或 36 或 32。

如法炮制，再来“三变”。去除“三变”的余数后，茎数有 36、32、28、24 四种可能。用这 4 种可能出现的数除以 4， $36/4=9$ ，9 为老阳，会变为阴爻； $32/4=8$ ，8 为少阴，不变； $28/4=7$ ，7 为少阳，不变； $24/4=6$ ，6 为老阴，会变为阳爻。

这就得到了一个爻。反复六次“三变”，可以得到六个爻，也就是一个“卦”，有变爻的，变了之后的卦称为“之卦”。还是要感谢考古队，这种“成卦术”，我们已有了明确的证据，不迟于西元前 1200 年，就已经有了。以朝代论，约略在殷太王迁都之前。

“三变而成爻”，“十有八变而成卦”，说起来很复杂，但真正操作起来，反倒是方便得很。就像用筷子夹菜，要描述清楚，非得洋洋千言以上不可，但却没有哪个中国人是不会的。这叫做“日用而不知”。禅宗祖师说

得更绝了——“只许老胡会，不许老胡知”。“会”了自然“知”，若是先“知”了，反倒要障碍那“会”。

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为是神秘的东西。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些巫术的遗迹。那时候又相信数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学里用得着它。我们现在还说，凡事都有定数，这就是前定的意思；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数，世界也有数，数是算好了的一笔账；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机械的。数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1]，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说是一种巫术，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是一；断画“- -”是二；三画叠而成卦是三。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 — — — — — — —；乾、兑、离、震、艮、坎、巽、坤是这些卦的名字。那整画、断画的排列，也许是在排列着蓍草时触悟出来的。八卦到底太简单了，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按照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蓍草的应用，也许起于民间；但八卦的创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与卜官大约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与卜官同时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记载，一切的档案，都掌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当时知识的权威，参加创卦和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简便得多，但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时候，还有“筮短龟长”的话^[2]。那些时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还得用卜的。

筮法袭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里的兆象，据说有一百二十体，每一体

都有十条断定吉凶的“颂”辞^[3]。这些是现成的辞。但兆象是自然的灼出来的，有时不能凑合到那一百二十体里去便得另造新辞。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当于一百二十体的兆象。那断定吉凶的辞，原叫做繇辞，“繇”是抽出来的意思。《周易》里一卦有六画，每画叫做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数的。繇辞有属于卦的总体的，有属于各爻的；所以后来分称为卦辞和爻辞。这种卦、爻辞也是卜筮官的占筮纪录，但和甲骨卜辞的性质不一样。

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周初叶的纪录，纪录里好些是不连贯的，大概是几次筮辞并列在一起的缘故。那时卜筮官将这些卦、爻辞按着卦、爻的顺序编辑起来的，便成了《周易》这部书。“易”是“简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的意思。

疏释：

“不易”与“变易”绝非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数理逻辑之“减（简）”，因为“不易”不是“变易”的彼端，这个“不易”是“变易”背后的质、神，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简”是怎么“简”的呢？真的是个“方法”吗？所以，如果不以数理逻辑

把“周”字释为周代，“易”释为简易，显然是“古史辨派”的新说，不妨把古说并列在这里，对比着来看。

古说“周”是周而复始的圆周，“易”字上日下月，指的是时间与天地。所以《周易》说的是天地日月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这天地日月的运动变化也就产生了我们周围万事万物的变化。在《周易》的原话叫做“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后来又有了悟道的人，进一步解释“易”字说有“三原则”：首先是世间一切都在“变易”，随时随地都在变，没有可以持续的存在。看似持续的存在，只是我们不能证悟“变易”时的幻相。最终是“不易”，在变易的一切的背面，只是一个。也就是50茎蓍草最先取出的那一根，最神圣的一根！这变易的一切背面只是这一个，叫“一切即